

抗战时期中日文学作品中的民族观念研究

王思璇¹

【摘要】：抗战时期，民族观念在中日两国的文学作品中被不断强调，但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的不同，两国文学中的民族观念又存在差异：乡土与人民是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民族观念的突出元素；而狭隘扭曲的“皇国”心态则构成了抗战时期日本文学中民族观念的核心。中国抗战文学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日本侵华文学则煽动了民族仇恨，沦为侵略战争的帮凶。

【关键词】：抗战文学 侵华文学 民族观念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22）04-0114-08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艰难的国运亦对文运产生了影响，抗战文学应运而生。作家们直面战火中的中国，高举民族的旗帜，书写了现代文学中最为悲壮的一页。其实，民族观念不是古已有之的，徐迅指出：“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中国就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鸦片战争的炮火迫使中国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国人才被迫以陌生的国家观念取代了传统的天下观念，使中国人凝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1] (p221)}在历史大变局中，传统的天下观念不能适应时代思潮，而民族观念则被逐步确立。换言之，民族观念之所以被抗战文学高举缘于在抗战过程中民族意识的觉醒。日本学者石岛纪之认为：“通过抵抗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思想水平，尤其是它在农村地区的渗透及中国国家、民族的统一。”^{[2] (p201)}所以，伴随着日军侵华，民族观念这一文艺主题也愈发突出。同时，民族观念在抗战文学中高举与日军侵略密切相关，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对日本侵华文学中的民族观念进行梳理。

关于中日两国民族观念的发展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学界已有了一定研究，如陈廷湘对抗战时期各派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了系统分析；^{[3] (p176-191)}陈树涵追溯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过程中的民族优越思想；^{[4] (p122-125)}王富春则认为“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最终导致日本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战后又拒不认罪的深层次原因之一”；^{[5] (p65)}李怡指出陈铨及“战国策派”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不属于自由主义，而是以真诚的民族情怀为起点最终又拥有了服膺国民党政权的国家观念；^{[6] (p126)}王向远对以“士兵三部曲”为代表的侵华文学歪曲抗战事实，煽动日本国内民族情绪进行了批判；^{[7] (p62-69)}黄万华诠释了民族危机下战时文学的生命力。^{[8] (p103-108)}学者们的研究各有侧重，而本文旨在通过进一步分析比较抗战时期中日文学中的民族观念差异，以更好发掘我国抗战文学的思想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抗战时期中日文学作品民族观念的差异

（一）乡土与人民：抗战时期中国文学中民族观念的核心元素

十四年抗战文学依其展现顺序，依次为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主要体现了作家对于故土沦丧的哀鸣与呐喊，国统区文学集中表现了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解放区文学则重在讴歌人民抗争。无论文学形式如何多样与变化，抗战文学活动都集中诠释了民族观念的文化建构意义。这就是抗战文学展现了“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自在走向自觉、从散漫走向团结、从沉沦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和精神丰碑”，^{[9] (p22)}高扬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作者简介：王思璇（1992—），女，武汉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56）。

基金项目：武汉市社科联一般课题“抗战时期中日文学国家观念比较研究及其当代价值”（WHSKL2021129）的阶段性成果

1. 沦陷区作家的呐喊：乡土观念的升华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迅速沦陷，生活在白山黑水的三千万父老被日军奴役、蹂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东北作家群”中的萧红、萧军、舒群、端木蕻良、罗烽、白朗、李辉英先后发表《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没有祖国的孩子》《科尔沁旗草原》等代表性作品。《生死场》是萧红创作的中篇小说，主要描述了女性在男权世界里卑微而无助的生活和死亡。所谓的“场”，即是在那块灾难深重的黑土地上生活着的一个个悲苦的灵魂。胡风曾谈及《生死场》中的“奋起”：“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10] (p397)}即便是乡村的普通农民也有勇气直面侵略者，正是这些悲壮的奋起激活了作者的乡土观念。《八月的乡村》是萧军所著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党领导下农民支队与侵略者进行血与火斗争的故事，展现了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鲁迅特为《八月的乡村》作序：“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蝥蛄，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11] (p227)}流亡的悲惨是东北作家的心路，他们作为亲历者，目睹家园毁于战火，自身如浮萍漂泊，“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12] (p60)}周立波评《没有祖国的孩子》时说：“他的人物很单纯，很直率、勇敢，有着独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对于一切加于民族和自身的压迫，不能忍耐，这和我们许多同胞对于异族的任何迫害和侮辱怀着奴性的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争取解放的中国民族，正需要这样的人物。”^{[13] (p864-865)}强调了失去乡土、没有祖国的群体，却正是争取民族解放的有生力量。

穆木天在《北江岸上的歌者》中把土地比作母亲，倾吐着浪迹天涯的羁旅愁苦：“为什么他们弹奏得那么悲凄！是不是为要使没有家乡的人流涕！……三年来帝国主义的铁蹄，使得多少人奔走流离。黎明和薄暮中，这江上的烟雾呀，可曾引起他们的无言的乡思！”^{[14] (p168)}李辉英在《松花江上》写道：“这一把反抗暴力的摧残的正义的火焰，依着白龙似的奔流着的松花江岸，在这一向平静无事而现在在众人愤怒中的村子燃烧起来。”^{[15] (p4)}在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宏阔背景下，东北流亡左翼作家“首先揭示了广袤的东北大地上觉醒抗争的普遍性与广泛性，生动再现了在灾难降临的变动时刻，广大的人群纷纷从压迫中觉醒，从挣扎中奋起，汇成一股被奴役人民不甘屈服的宏大历史潮流”。^{[16] (p269)}缘于土地的失去、家园的破碎，东北流亡作家的笔触开始从个人命运延伸到对民族命运的思考。胡安·诺格曾说：“民族主义感情屡屡通过对过去的崇拜而表现出来，而这个过去，自然要体现在一块领土上。对于民族主义来说，领土就是承载民族过去的载体。”^{[17] (p55)}领土对于民族就是如此重要，同时，领土的沦丧意味着乡土观念被激活，从而对文学创作又形成直接影响。狄迺曾论述道：“‘九一八’事变不但使文学的方式起了一些转变，而且使写作方式上也起了划时代的变化。”^{[18] (p7)}所谓时代变化，就是抗战文学拉开了序幕。

目睹日军铁蹄踏破白山黑水、东北父老备受凌辱，东北流亡作家的乡土观念急剧强化。从乡土到国土、从家园到家国，作家们的民族观念在乡土观念上扬的过程中亦逐步增强。

2. 国统区作家的抗争：民族意识的觉醒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中国抗战文化史上的大事。武汉作为当时中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汇聚着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有的已经破碎了家园，从敌人的炮火底下逃避出来，负起了悲苦的流亡的命运。有的正完毕了一天的紧张的工作，走向安静的和平的寓居，也有的是刚刚从日班的影戏院出来，心目中还遗留着好莱坞大腿的残影”。^{[19] (p137)}一时间各路文化精英也云集在此，侵华日军的枪声击碎了文艺家的梦，他们“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里，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亭子间，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场所；而是从他们生活习惯的都市，走向了农村城镇；而是从租界，走向了内地……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也是一个不小的开拓，使文学活动真正的放到了战斗的生活领域中去”。^{[20] (p4)}作家们以笔做枪，投入时代洪流。姚雪垠在这时期创作了《白龙巷》，满怀深情讴歌了为了民族而勇于牺牲的空军战士。武汉空战令世人瞩目，作家用手中的笔书写中国空军的英勇，意在进一步激发人民抗战的勇气和力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国家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有良知文人的共同呼声。巴金写道：“上海的炮声应当是一个信号。这

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面。”^{[21] (p549)}从个人到整体，从小我到民族，作家的情感不断升华。艾青更是用生命书写《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情感真挚的诗篇。“土地”“中国”等诗化的意象直接出现在诗人笔下，这不但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民族意识的觉醒。

抗战文学的创作队伍，尤其是“从沦陷区内移的广大师生，有深刻的国破家碎的亡国之痛”，^{[22] (p204)}他们拿起手中的笔书写对民族的炽热情感，为唤起民众而奔走呼号。这一时期，著名文化流派“战国策派”遇时而生。作家们在悲痛中呐喊，在呐喊中前行，在前行中书写。无论在武汉、重庆还是昆明，国统区的作家们为民族的情感、国家的独立坚定地发出声音。1942年，郭沫若撰写的话剧《屈原》被搬上重庆的舞台，一经演出，万人空巷。尤其《雷电颂》一章，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各行业的代表在观剧后无不赞叹，国人抗战士气为之一振。

随着全民族的抗战的到来，呐喊声后的文艺也无形发生变化，正如老舍所说：“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了争取和平与自由的经验与方法。”^{[23] (p147)}郁达夫也断定：“中国的文艺，经此一番巨变之后，将截然地，与以前的文艺异趋，这是可以断言的。以后的中国文艺，将一般地富于革命性，民族性，世界合作性，是毫无疑问的。从前的那些不正确，无实感，有造作性的革命文学，民族文学，必将绝迹于中国的创作界，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经此一番抗战之后，中国文艺才真正地决定了与社会合致，与民族同流的可能与必然。”^{[24] (p292)}

抗战文学的革命性、民族性，其实也揭示了内在的民族观念。当时的中国虽然没有实现真正统一，意识形态也尚未整合，但作家们普遍意识到个人力量微不足道，只有国家强大才有个人安全，只有民族团结才有民族独立。对于国统区的作家们而言，无论是剧本创作，还是小说写作，抑或诗歌抒怀，都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表达。

3. 解放区作家的战斗：人民赞歌的吹响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枪杆子”，而且重视“笔杆子”。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25] (p4)}1937年11月，在日军占领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张闻天作了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明确“适应抗战”是当时文化界的核心任务。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张闻天的报告代表了中共高层对文艺的态度，即作品要体现民族的革命精神、要为抗日服务、要书写国家观念。早在1937年8月，八路军便成立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由丁玲、吴奚如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9月，西战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前线，写下了不少抗日作品。由毛泽东命名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先后派出六个组奔赴前线，撰写作品讴歌人民抗战的辉煌与苦难。解放区文学的创作队伍不仅有专属文艺团体，而且包括了部分领导干部，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有《出太行》《悼左权将军》等诗，表达了对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军、英勇战斗的讴歌。新四军军长陈毅写下了《闻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诗词，执笔了《新四军军歌》，歌词由“民族生存”写到“抗战建国”，这是共产党人的豪情，也是对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奋起抗日的鼓舞。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明确战争的性质并分析人民抗战胜利的原因，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26] (p509)}“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6] (p5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为解放区抗战文学指明了方向，解放区文艺作品呈现出的人民抗战图景，彰显出文学的人民性。

这一时期，先后涌现出《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八路军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南泥湾》《歌唱二小放牛郎》《白杨礼赞》《荷花淀》《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等经典作品。其中，《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谱曲，慷慨激昂、气势如虹，在延安公演后，极大鼓舞了全国抗战。“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歌词层层递进，从家到国，情感不断升华，这是人民的赞歌，也是时代的抒怀。

解放区文学是吹响人民赞歌的抗战文学。有了根据地，人民作家不再流亡；有了文艺方向，人民作家不会迷茫。作家的笔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从白山黑水到长江两岸，再到黄土高坡，作家们随战火不断迁徙，他们品尝乡土沦陷之苦，体味民族觉醒之力，最后把目光聚焦于人民，正是人民群众撑起了抗日的大后方，为抗战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所以，只有讴歌民众才能真正激活民力，才能收复沦陷的乡土，才能保卫全中国。确切地说，抗战文学中的民族观念至此真正树立。

综上，经过东北作家群的呐喊、国统区作家的抗争以及解放区作家的战斗，民族观念的高涨为抗战文学注入无穷力量。陈铨于1942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民族文学运动》一文，明确提出了“民族文学”的理论主张，即“要使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要为祖国生，要为祖国死，他们要为祖国展开一幅浪漫、丰富、精彩、壮丽的人生图画。有了这样的民族意识，伟大的民族文学运动才可以成功”。^{[27] (p718)}

（二）狭隘扭曲的“皇国”心态：抗战时期日本文学中的民族观念

1. 日本侵华“国策”与“笔部队”

在中国抗战文学兴起的同一时期，日本侵华文学也日益兴盛。著名学者王向远写道：“‘侵华文学’，指的就是以侵华战争为背景、为题材，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日本文学。”^{[28] (p前言2)}1931年，日本法西斯文学创作被倡导；1932年，日本法西斯文学团体“国家主义文学同盟”成立；1936年，国策文学团体“文艺恳谈会”召开；1937年，“内阁情报部”成立，同年9月林房雄等作家开赴中国战场；1938年，国策文学正式登场；1940年，“大政翼赞会”成立；1941年，日本强征作家从军；1942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这些事实表明日本文坛已被军国主义控制。日本政府对文学界高度重视，菊池宽明确表示希望所有作家都从军，并会事先给作家们在靖国神社办好安置遗骨的手续。王向远指出：“‘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或歪曲描写日占区的状况，……或炫耀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夸耀自己的战争体验……”^{[28] (p78)}火野葦平便是侵华作家的代表，他美化侵华日军暴行的作品，在日本国内极为畅销，被尊为“报国文学”的榜样，火野葦平也一度成为“民族英雄”，日本文坛由此掀起一股“国策文学”的逆流。火野葦平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和他们一同向死中飞去，他们都已老早超越了死线，单单是这一种行为，知道他已经是可以解决一切的了。我们在弹雨与泥泞的战场，本来是极其单纯的，而又是极其坚决的被结合在一起，真是毫无一点思考价值的那么简单，这全然是我们这些兵们，渐渐的强化，活跃，为了守护祖国而向前进发，真是比什么都简单而单纯，也正是最崇高的事情啊。”^{[29] (p87)}火野葦平狭隘的民族观念便是为杀害中国的军民而毫不吝惜生命。张泉先生说：“法西斯侵略者的最终目的，是要消解占领区域内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概念。”^{[30] (p13)}由此可以感知日本侵华文学的反动性与破坏力。日本侵华文学所表达的民族观念是对其侵略行径的美化，对民族强权的推崇，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和对利益的攫取。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种族文化在某些时候是与包含着与侵略、征服甚至灭绝邻人的传统和价值观相联系的”。^{[31] (p29)}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军国主义思想统治着日本的文学艺术，影响着当时日本社会的心理文化，形成了宣扬反和平、反民主、反人类的东亚“圣战”之逆流，产生了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正如李大钊揭露的，“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32] (p610)}

2. 日本皇权思想与侵华文学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天皇权力的强化，使其对国民思想的影响日益增强。根深蒂固的天皇神话，使“皇国”观念深植日本民众心中。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人较早产生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皇国”观念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公布以“君权神授”和“主权在皇”为立宪原则的《大日本帝国宪法》。随着宪法的确立，日本人的“皇国”观念被逐步强化，日本也走上极端妄想的“皇国”之路。大和民族“最优”的种族观念逐步渗透进国民思想意识之中，为发动侵略扩张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中日战争中，战败的将官多数向天皇致敬而后自杀。同时，对广大日本士兵而言，天皇如同大神一般供奉于他们的心间。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接受占领。”^{[33] (p98)}令人诧异的背后实则是日本神权天皇制对

百姓的思想荼毒。受民族优越论思想的影响，侵华作家们在作品中不断强调战胜中国获取利益才是对天皇忠诚的思想。侵华战争中，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态度可以归结为“对国家忠诚”。现代日本学者中村元曾指出：“事实上，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年），天皇崇拜一直是日本最强有力的信仰形式；甚至于在战败以后的今天，天皇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仍然有他自己的地位。日本人喜欢把天皇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看作日本国民的集中代表。……只有在我们日本，从神话时代以来，国土与皇室就是不可分离的。”^{[34] (p301)}

抗战中期，杂志《日本短歌》新年号的编后记中明确表示，期待短歌这一诗歌形式与“皇国”迅速发展一起，迎来新的进步，向“皇纪二千六百年”（1940年）献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学者爱国大会”在“大政翼赞会”大会议室举办。高滨虚子宣读了天皇的战争宣言；高村光太郎朗诵了《攻击他们》，鼓吹日本屹立于东亚之巅，代代相承经历数千年的磨炼，作为必胜之军，必紧握必杀之剑。“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时更是用纲领性文件宣扬“皇国”思想，妄图集结全日本文学者之力量，确立实现“皇国”传统和理想的日本文学、助力宣扬“皇道文化”。正是在“皇国”思想的蛊惑下，日本侵华文学高呼：“国民信仰诸神直系相传，国民处在民族血统中心的天皇统治下，……为了国家之独立、名誉和使命，舍弃生命战斗的国民士兵，呼唤着天皇的名字赴死。”^{[35] (p151)} 侵华文学的鼓吹一方面歪曲事实，遮蔽了战争的侵略性；另一方面荼毒人心，使更多日本士兵死于战争。日本玉川大学教授若槻泰雄指出：“在战时的报刊杂志上，经常能看到勇敢的将士在生命即将结束时，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报道。”^{[36] (p95)}

诚然，长期的宣传教育使日本国民坚信天皇的权威，认同扩张侵略亦是“大东亚共荣”的必经之路，但依旧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反思。若槻泰雄回忆说：“我还在日本人的学校里受到了侵略战争的各种基础教育，并曾深信不疑。什么‘日本是万邦无比的神国’，‘天皇陛下虽为人身，但其本质是神’，因而，‘对外国人来讲，能置身日本天皇陛下的统治之下，是极为幸福的’，‘同中国人进行的战争，是为了让中国人得到幸福的圣战’，……整个日本的每一个国民都被强行灌输这种思想。……于是乎，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神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中。”^{[36] (p 中文版前言 1)} 宫崎滔天晚年在他的著作中感叹：“回顾我们民族，傲慢已极，自是井底之蛙，却对东方无理至极。若因果报应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则我国必有亡国之运，国民必尝其悲惨。”^{[37] (p150)}

近代以来，日本皇权下滋生的民族意识融合了“忠君爱国”的历史传统，在这一意识形态和利益的驱动下，日本必然产生对外扩张思想和侵略行动。“日本人的民族观是一把两刃刀，一面可以抵抗外族侵略，另一面则又侵略别的国家。”^{[38] (p200)}

二、激励与戕害：中日战时文学对中国民众的影响

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公共观念。中日之间关于“公共”的理解有着根本分歧：近代之后，中国人所理解的最大的“公共”是中华民族，而日本人所理解的最大的“公共”则是天皇。由此产生的民族观念也是不同的：从孙中山把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探索反帝反封建的救国道路，到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再到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勇毅奋斗，均体现出中国的民族观念是一种健全的、包容的观念，是民族独立、平等、进步、发展的精神支撑；而当时日本的民族观念极度狭隘，在日本社会意识中，天皇就是大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由此观之，中日两国文学在抗战时期体现出的民族观念之所以存在较大差异有着深刻原因：中国抗战文学强调民族观念是为了开启民智，促进民权独立、民族觉醒；日本侵华文学强调民族观念则是为了美化侵略，宣扬皇权至上。

（一）中国抗战文学激励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

抗战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民国时代。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民智已渐开，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为当时的中国指明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方向。在这样的现实下，抗战文学的民族观念早已摆脱了封建君主制度下的狭隘观念。抗战时期的中国作家既是战火的亲历者，又是自发的反抗者。无论是在沦陷区的东北、北平、上海、武汉，还是在国统区的重庆、昆明，抑或是在解放区的延安，中国作家不分党派、不分地域、不分种族，只为一个中国呐喊，只为中华民族奋斗。

随着国土的沦陷，一个个小家庭走向破碎，一条条生命凋零战火，国破如此，人民何安？没有民族独立，何来国家强盛？家与国的辩证关系、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关系从未如此明白。从东北流亡到西南暂安，作家们用自己的血泪呼唤大众的民族意识。历经十四年苦战，中国人民最终以巨大的代价赢得胜利，建设新中国成为国人之期盼，这是对民族观念最有力的生动阐释。一部部抗战作品也成为时代记忆，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历史业已证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只要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国民，没有一个不该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所有，统统交给国家”。^{[39] (p29)}这一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抗战作品。如茅盾的散文《白杨礼赞》，夏衍的话剧《法西斯细菌》《愁城记》，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等，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展示了大后方的创作实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深远影响，孙犁、丁玲、周立波、马烽、西戎、胡正、孙谦等都创作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佳作。甚至远在西南边陲的爱国诗人如冯至、穆旦等，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仍然坚持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实践。

中国抗战文学宣扬的民族观念背后折射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如徐中玉先生所言：“在国家民族范围之内，人们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与进步，就是爱国主义炽热的保证。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才能发展其良知良能，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贡献于国家民族。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才能‘感觉’到爱国的必要，爱国才不是一个悬空的理想，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道德，真能鼓舞群伦，使人生死以之的道德。”^{[40] (p37)}这种爱国主义的民族观念可以赋予人们战胜困难和敌人的信心，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二）日本侵华文学戕害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大和民族主义疯狂抬头。1938年，仓田百三在《日本主义文化宣言》中声称：“日本之国体无与伦比。其在品位、纯洁、血统的协同性和坚守誓言等方面，断然居于万邦之上。”^{[35] (p151)}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指引下，日本作家被送到中国战场去完成军部的政治任务。据火野葦平记述：“这回事变勃发以来，关于战争的文章，竟多如洪水般的发表了。又有很多高超的人们，来到战场，写出来了很多出众的文章。还有以感动的文词，缀成了在战场里血涌肉跃的壮烈武勇传，忠勇以至鬼神感泣的美谈，有趣味的故事。”^{[41] (p 写在前面)}被征召的日本作家不仅不去辨析，反而乘势为军部摇旗呐喊。例如“作为法西斯主义文学家，保田与重郎主要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看待日本的侵华战争，而是从他‘浪漫主义’的‘美学理念’出发，把日本的侵华战争视为他所理想的‘日本浪漫精神’的实现，极力把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文学化’和‘美学化’，鼓吹所谓‘作为艺术的战争’，把侵华战争本身看成是日本人的根本的‘精神文化’。”^{[28] (p11-12)}因此，王向远特别指出：“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场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争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28] (p95)}日本侵华文学，处心积虑为其民族利己主义开脱，肆意掩盖罪恶本质，对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造成极大伤害。

日本战时的诗歌也是戕害中国民众的武器。1937年10月，金子光晴曾写下助战诗句，鼓吹为了所谓的必须胜利，即便如飒飒风中的小草也需要动员起来。1941年2月，日本青年诗人联盟成立。该联盟举办了“爱国诗晚会”，开展“爱国诗运动”，并编辑了《现代爱国诗集》《兴亚诗集》《大东亚战争决战诗集》等诗集。他们用所谓“爱国”的旗号来为日军侵华粉饰。这些诗歌对日本民众而言，或许能起到凝聚人心之效；但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则是赤裸裸的戕害。同时，日本教科书公然把日本称为神国，强调其是亚洲大陆和太平洋的中流砥柱，认为只有日本才最合领导“大东亚”，而中国则由于广大而无法实现国家统一，从古至今一直处于战乱兵燹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所作所为正是为了拯救中国人脱离苦海。

总之，侵略文学无论是对日军暴行的美化，还是对“圣战”的鼓吹，都是对侵略战争的粉饰，都掩盖不了日本侵华的罪行。

三、结语

张中良先生多次呼吁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揭示抗战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他特别指出：“抗战文学既有抗战，也有文学，抗战是中华民族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地反抗，文学是广袤深邃流光溢彩的审美世界。”^{[42] (p9)}在审美世界里感知绝地

反抗的精神，无疑是对抗战文学的最好注解，抗战文学蕴含着深沉的民族情感并激活了人民大众心目中的民族观念。从小家庭的破碎到大好山河的沦陷，从民族救亡的呐喊到建设新中国的奋斗，民族观念一直在不断充盈着抗战文学作品。无论小说、诗歌、戏剧，还是报告文学，各种文体都被抗战救国的热情灌注，在十四年的峥嵘岁月里书写了一曲曲壮歌。无论当时的读者，还是今日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都被强大的民族情感所震撼，被英雄无畏舍己救国的信念所洗礼。周扬着重强调了抗战文学的教育价值，即“用民族民主革命的精神去教育读者，提高他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43] (p409)}可见，抗战文学背后彰显的民族观念，在无形之中推动了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进步。抗战文学的魅力在于让读者从作品中获取力量，不断觉醒，从而为拯救破碎山河奋力抗争、殊死战斗。而这魅力背后则是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因为“它底方法的正确性与优越性，保证了模铸中国的典型，描写中国的性格，丰富中国文学的形式，创造中国文学的风格，革新中国文学的姿态”。^{[44] (p1055)}所以，虽然时过境迁，但抗战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45]在新的历史时期，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学做人民的孺子牛。从抗战时期到新时代，历史见证了民族观念的时代传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必然给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注入新时代的价值，必将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文学艺术要为此抒写、抒情、抒怀，吹响前进号角，展现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积极作用，用新时代文艺的灿烂促成民族伟业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徐迅.民族主义（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日]石岛纪之.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众：饥饿、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M].李秉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3]陈廷湘.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J].抗日战争研究，1996, (3).

[4]陈树涵.民族优越论：日本对外侵略的重要思想源流[J].史学月刊，2002, (12).

[5]王富春.战前日本的民族意识与侵华战争[J].南开学报，2003, (6).

[6]李怡.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怀的龃龉——陈铨的文学追求及其历史命运[J].文学评论，2018, (6).

[7]王向远.炮制侵华文学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J].名作欣赏，2016, (7).

[8]黄万华.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J].文史哲，2002, (3).

[9]王文兵,郭华.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5).

[10]胡风.胡风评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
- [12] [美]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单德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 [13] 周立波. 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间[J]. 光明, 1936, 2(2).
- [14] 穆木天. 穆木天诗文集[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5.
- [15] 李辉英. 松花江上[M]. 重庆: 建国书店, 1945.
- [16] 逢增玉. 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 [17] [西]胡安·诺格. 民族主义与领土[M]. 徐鹤林, 朱伦, 译.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狄迺. “九一八”以来中国文学的新转变[J]. 民意(汉口), 1938, (40).
- [19] 适夷. 江上——武汉漫写之一[J]. 抗战文艺, 1938, 1(11).
- [20] 罗荪. 抗战文艺运动鸟瞰[J]. 文学月报, 1940, (1).
- [21] 巴金. 一点感想[M]//巴金文集: 十.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22] 彭承福. 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5.
- [23] 舒舍予. 保卫武汉与文艺工作[J]. 抗战文艺, (12).
- [24] 郁达夫. 战时的文艺作家[M]//郁达夫全集: 第11卷文论(下).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 [25] 毛泽东.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文艺论集. 北京: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26] 毛泽东. 论持久战[M]//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7] 陈铨. 民族文学运动[M]//张昌山. 战国策派文存(下).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 [28] 王向远. “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29] [日]火野葦平. 土与兵[M]. 北京: 东方书店, 1939.
- [30] 张泉. 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J]. 抗日战争研究, 2002, (1).
- [31] [美]菲利克斯·格罗斯. 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 王建娥, 魏强,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 [32]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上)[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 [33][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增订版)[M].吕万和,熊达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34][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M].林太,马小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35][日]铃木贞美.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M].魏大海,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 [36][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M].赵自瑞,等,译.孙叔林,孙焕林,审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37][日]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M].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 [38]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 [39]宋致新.国统区抗战文学钩沉:上[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6.
- [40]徐中玉.爱国的活道德[M]//徐中玉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41][日]火野苇平.麦田里的兵队[M].穆六田,阅.雪笠,译.“新京”“:满洲国”通讯社,1939.
- [42]张中良.重新认识抗战文学的历史地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9).
- [43]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M]//延安文艺丛书:第一卷文艺理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 [44]洁孺.论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J].文艺阵地,1939,(8).
- [4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